

“丝绸之路”与中俄文化交流

潘光

在“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启动之前，中国与俄罗斯（苏联）的文化交流与“丝绸之路”密切相连，但又限于“丝绸之路”的地域范畴。

自2017年6月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中国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各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发展，主办上合组织峰会是2018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之一。目前，关于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和安全反恐合作的著述甚多，但人们对上合组织人文合作的历史和现状却知之不多。本文拟重点探讨上合组织进程的历史文化底蕴及上合组织人文合作取得的成绩。

上海合作组织进程的历史文化底蕴扎根于中华文化、俄罗斯文化和中亚各民族文化之间上千年的交流和融合之中，而贯穿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由于中国与俄罗斯（苏联）幅员辽阔，两国的文化交往更超越了“丝绸之路”的地域范畴，但也与“丝绸之路”密切相连。以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基础，上海合作组织的人文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丝绸之路”—— 中、俄、中亚文明 交汇的桥梁

据史家研究，早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中国西周时代，在中国和希腊之间辽阔的草原、半沙漠和山区地带，就散居着许多游牧部落。希腊人称

他们为斯基泰人（Scythians，一译西徐亚人），中国人则将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和天山南北的部落称为塞人部落。正是这些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部落建立了穿越中亚地区的最古老的贸易联系。英国著名的东西方关系史研究权威G.F.赫德逊在其名著《欧洲与中国》中具体描述了由塞人等草原民族充当中介的从欧洲到亚洲的商路，它从亚速海启程，经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穿过中亚大沙漠，到达高峻险要的阿尔泰山。公元前6或7世纪，一位古希腊商人亚里斯特亚士（Aristeas）曾随斯基泰人到达天山山脉，他的见闻录《阿里马斯比亚》不但记

述了在中亚草原间往来的塞人部落，还提到在戈壁沙漠那一边，“有一片富饶的土地，人民定居务农，海水永不结冰”。这可能是欧洲人对亚洲东部最早的朦胧记录。尔后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等人也对欧亚草原的各民族作了详细描述，一直谈到天山附近的伊赛顿人。当时色彩艳丽的中国丝绸已进入希腊诸城邦，成为上层显贵的奢侈品。古希腊知道东方有一个生产丝的国家，以“赛里斯”（Seres）称呼它，便是根据汉语“丝”的译音而取。

公元前334—323年亚历山大帝率军东征，横扫亚洲西部和中部，几乎叩到了中国的

西大门，用剑与血开创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融和商贸大发展的新时期。如果说亚历山大帝国的出现曾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障古代亚欧交往通道西半段的畅通，那么随后东方汉帝国的昌盛则有助于这一通道东半段的开通，从而为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创造了条件。汉朝的中国是亚洲东部最大的王权国家，其控制力达到天山脚下，中亚不少游牧民族纷纷向汉朝称臣纳贡。公元前138和前119年，汉武帝派遣其侍从官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实地勘察了东西交通要道的东半段，开始了内地与西域、印

（下转8版）➔

◀（上接6版）

于两个人的手笔。

总体来看，中国文字书写与西方存在诸多不同。载体材质有纸与羊皮纸之别，笔有软硬之别，文字有表意表音之别，书写方向有竖行与横行之别。然而对比中西写本文献中的删除符号，不难发现，两者之间颇多相似之处。

首先，两者历史上最为常见的删除符号都是“点”。不同之处只在于“点”的位置。中国竖行抄写，表示删除的点在误字的右侧。西方横行抄写，表示删除的“点”在误字的下方，所以称为“下点”（subpunction）。当然，“点”的位置的不同是由于中国和西方文字书写方向的不同，所以这位置上的不同也可以统一为“行间”或者“行边”。

其次，古代写本文献中出现频率不及“点”，然而却都沿用至今的删除符号是“线”。不同之处在于“线”的方向。西方是贯通字上的横线，称作strike-through，中国以前是竖线，现在是贯通字上的横线，称作“杠”。《汉语大词典》“杠”有义项曰：“把有关文字用直线划去”。当然，“线”在方向上的不同也可以统一为“顺着文字书写的方向”。

还有，都能见到“点”“线”并用的例子。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线”和“点”结合在一起，形

成“卩”和“卜”。

中西删除符号的相同之处，值得深思。

虞万里先生在讨论“卩”与“卜”的由来时，认为“卩”并非如赵彦卫所说乃“非”字之半，而“应是竖线与三点之结合符号。既然竖线和三点都是唐以前的涂抹删节号，则其在运用过程中为加强指误意识而逐渐结合成一体，是情理中事”。（虞万里《郭店简〈缁衣〉“人苟言之”之“人”旁点号解说——兼论古代涂抹符号之演变》）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西方写本文献，比如奥金莱克抄本中误字上的通贯横线（strike-through）与下划点（subpunction）一并出现，共同表示删除。这种情形对虞万里先生的“情理”推测，无疑是一种支持。

然而西方通贯误字的横线并没有移至字下。中国古代写本中通贯误字的竖线如何移至字旁，需要有一个解释。

中国写本中表示涂灭的“点”也有点在字上的例子。《史记·梁孝王世家》“李太后亦私与食官长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乱”唐张守节正义：“张先生旧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点其字中心。”大概“点”也有一个从字上移至字旁的过程，以保持卷面的整洁美观。出于同样的原因，通贯误字的竖线移至字旁，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文字右边的竖线也可能有另外的来源。如前所述，张涌泉先生全面考察敦煌写本文献中的删除符号，除了点、“卜”、“卩”以外，还有“J”、“I”，等等。“J”括在所删文字右侧，明确显示所删文字的起讫范围。“I”大约是“J”的省简。由此我们推测，右侧的竖线也有可能是“J”的更进一步的省简。

文本的印刷传播技术，中西之间存在某种影响。文本的抄写传播方式，则很难说有什么影响关系。中西写本文献中删除符号的相似性，大约是由于都有从实际的涂灭到示意的涂灭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单个误字的涂灭，比较自然的做法就是点在字上。多个文字的完全涂灭，有的人从通贯字上的直线开始，有的人则是先用线条将所要涂灭的词句包围起来。由此便演化出点、线以及点线结合的各种删除符号。

文献传播的技术手段，大致说来，经历了抄写复制、印刷复制和电子复制三个历史阶段。电子复制，是近几十年正在发生的事情。印刷复制，也才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在有文字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文献的复制靠的是手工抄写。

文献传播进入印刷复制阶段的时间，中国比西方要早得多。一般认为，中国的雕版印刷肇始于唐代中后期，到宋代时已全面取代抄写。西方则是自

15世纪（相当于中国明代中期）古腾堡用金属活字印刷开始，很快取代了抄写。

尽管中国和西方进入印刷复制阶段的时间早晚不同，印刷技术也有雕版与金属活字之异，但是印刷文本对抄写文本的强势取代，则是相同的。雷诺兹、威尔逊《抄工与学者》：“早期印刷者，在将文本印刷之时，倾向于给予印刷文本一种权威和永久性。”（中译本第215页）“印刷商对抄本往往缺乏爱惜珍重，一旦用过之后，抄本的终身就托付给了出版商，从此前途未卜。”（中译本第140页）这类故事在中国用印刷文本取代抄写文本时也一定发生过，抄本被当作已陈刍狗，弃置不顾，宋代刊印本所依据的前代抄本早已不见踪影。西方因为这一替换事件发生的时代晚近，抄本幸存者众多。

今天考证古代典籍的文本，需要搜寻近古存真的旧本。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代典籍只有宋刊元槧明刻本。而西方古代典籍，所能找到的则是相应时期的甚或更为早前的抄本（中国宋元时期，西方只有抄本，没有印本）。

为了描写、鉴别、研究这些典籍旧本，中国文献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叫作“版本学”。与此相对应，西方则有一个学科叫作“写本学”（manuscript studies），又叫“古文书学”（paleography）。

中国的“版本学”与西方的“写本学”尽管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但仍有许多可以对照的地方。比如说，为了强调对相关文本证据的批判态度，启功在《〈文史典籍整理〉课程导言》一文的摘要中告诫学生“不能迷信宋本”——这里的“宋本”显然指刻印本（启功《〈文史典籍整理〉课程导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德国古典学家卡尔·莱尔斯则在其《古典语文学家十诫》一文中指出“不可跪拜抄本”。

尽管有些学者通过对“版本”的扩大解释，试图将写本也纳入“版本学”的研究范围，但是中国写本文献数量偏少，因而缺乏独立的、系统的研究，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敦煌写本文献的发现，战国秦汉简牍的出土，以及近年来著名作家手稿研究成为热点，独立的“写本学”的呼声越来越高。

张涌泉先生《敦煌写本文献学》第一章题为“写本文献学：一门亟待创立的新学问”，对写本文献学的内容、创立的意义和基础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我们极为赞同。这里我们只想补充一句，西方有着悠久历史的“写本学”，作为他山之石，对于中国“写本文献学”的创立，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